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部分音乐考古重要发现

方　建　军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，新的、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层出不穷，为音乐考古学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科学资料。

今选择一些新发现的重要音乐文物，按考古发掘单位(如遗址、墓葬、窖藏)和时代先后，简介如下：

舞阳贾湖骨笛

1986年5月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中，于78号墓清理出两件骨笛。至1987年6月，又先后发现十多件骨笛。加上78号墓所出，共有骨笛16件。

骨笛长20多厘米，直径1.1厘米左右。形制固定，制作规范，大多为七孔。个别骨笛在主音孔旁还有一小孔，或有可能与调音相关。保存最为完好的M282:20一件，通长22.2厘米，在第六与第七孔间靠近第七孔处又穿一小圆孔，即是典型的一例。

1989年初，黄翔鹏发表了一件骨笛(M282:20)的测音结果①。

这件骨笛的测音，由两名演奏者按上、下行音阶吹奏。所得音阶结构有两种，即：一、六声音阶（角·徵·羽·闰·宫·商·角·徵)；二、七声音阶(宫·商·角·和·徵·羽·变宫·商)。

舞阳贾湖骨笛的出土，是音乐考古的一个重要发现。骨笛所属考古学文化为贾湖类型，此类型的文化分早、中、晚三期，其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。经碳十四初步测得的数据，此文化类型为距今约七、八千年。所出骨笛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乐器。

以往有学者认为中国笛子由外国传入，还有学者提出笛子由西域传入中原。贾湖骨笛的发现，其年代比上二说的论据要早得多。因此，笛子应是起源于中国本土，西来说、外来说都不能成立。

贾湖骨笛的惊人之处，还在于它的制造工艺和音阶构成。

骨笛在钻按孔前，刻划有等分符号以确定孔位。笛管为猛禽腿骨制成，管径和管内壁都有自然生成的不规整性。它是开管乐器，用类似塔吉克族鹰骨笛、哈萨克族斯布斯额的斜吹法，居然能构成六声或七声音阶。

这些骨笛所构成的六声或七声音阶，如果在当时确实使用的话，那么，它与同期或后期的旋律乐器仍处于一声、二声或三声音列的总体发展水平悬殊过大的问题将如何解

---

① 黄翔鹏：《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》，《文物》1989年1期。

释？难道唯独贾湖类型的音乐文化比晚于它三、四千年的音乐文化要先进那么多？

与骨笛同出的杈形骨器和龟很可能与原始宗教和巫术仪式有关，骨笛会不会也与此有关而有用作法器的可能？

这些问题，要想得出合理的答案，还需要积累更多的资料。

临潼姜寨陶埙、陶响器

1972年至1979年，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陶埙3件、陶响器2件。

三件陶埙，可分二式。

Ⅰ式：2件。仅一吹孔，圆腹尖底，形似橄榄。细泥红陶捏制，浅红色。这两件埙皆出M358。M358:16，长5.5、腹径2.9—3.5、吹孔径1厘米；M358:17，长7、腹径3.5、吹孔径1.3厘米。

Ⅱ式：1件。二按孔。圆腹平底，吹口端锐。细泥捏制，红色不纯正，有灰斑，表面饰不规则绳纹。高5、腹径4.5、底径2.5、吹孔径0.7厘米。

陶响器二件，一件出于M358，扁圆体，中空。细泥红陶制成，高7、径11厘米，摇动有清脆响声。另一件出于M76，泥质红陶制成，形似枣核，内有沉重响声。长5.8、径3厘米。

陶埙和陶响器都属于姜寨二期，属仰韶文化史家类型，距今约5500年。其中Ⅰ式埙和扁圆形陶响器同出于M358，此墓为84人二次合葬墓，属姜寨二期晚期墓葬。

吴钊等对姜寨陶埙进行了测音，测音方法采用控制吹奏和自然吹奏两种①。用后一种演奏方法所得的听觉印象是：

M358:17　　E_{5}

M358:16　　F_{5}

ZHT_{15}⑤:24　　$A_4—B_4—C_5—D_5$

如果加上控制音，ZHT_{15}⑤:24二按孔陶埙的发音就是：

$F_4—G_4—A_4—B_4—C_5—D_5$

为此，吴钊同志提出了所谓清角、变宫的出现问题，值得大家注意。而采用控制音的方法对出土陶埙进行测音，是否合理、可行，也还可以考虑。

姜寨遗址大面积的揭露，展示了它自身的文化内涵以及与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关系。此遗址乐器的出土，更为我们研究史前音乐文化提供了十分难得的科学资料。

姜寨一吹孔而无按孔的陶埙，形制与50年代西安半坡遗址所出埙很相似。二者虽同属仰韶文化，但姜寨埙与半坡埙的文化类型却不同，且前者的时代要晚一些。联系起来看，探讨仰韶文化埙的起源和演变问题就增添了新的资料。

姜寨二按孔埙，形制与龙山文化圆腹平底埙相类，在同型埙中时代算是较早的。它为我们探索龙山文化此式埙的渊源提供了线索。

姜寨出土的陶响器，是一种原始的摇奏乐器。这种乐器，在中国的许多地区都有发现，形制也不尽相同。惟姜寨出土的扁圆体陶响器，目前尚不多见。这种摇奏乐器虽然简单，但在原始人的音乐生活里可能占有相当比例。

襄汾陶寺墓地鼍鼓、特磬、土鼓

1978至1980年，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出土了鼍鼓、特磬、土鼓（？）等打击乐器。这些乐器分别出自五座早期甲种大型墓，每墓出特磬一、鼍鼓二、土鼓（？）一，其组合有一定规律。②

特磬十分厚大，多系采用天然胶页岩岩片打制而成，表面凹凸不平，整体厚薄不一。磬的外形尚不规整，倨句不分明。最大一件

① 半坡博物馆等：《姜寨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8年。

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：《1978—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》，《考古》1983年1期。

(M3002:6)，通长95、宽43、厚1.2—1.5厘米，重30.75公斤。

两件磬的音高是：

M3004:6　　C_5^{-23}

M3015:17　　$F_5^{\#-23}$

鼍鼓均经彩绘，鼓框系以整木挖空制成，呈竖立桶形。鼓皮已朽，但鼓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不等，应是用以蒙鼓面的鳄鱼皮。

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有“鼍鼓逢逢，矇瞍奏公”的描述，鼍即鳄鱼。因此，陶寺这种膜鸣单面鼓，应即文献记载之鼍鼓。

这些鼓的腔内，还常发现一些黑褐色低温陶的小圆锥体，高0.5—1、底径1—2厘米不等。它们可能是贴附在鼓皮上，作调音之用。

与特磬和鼓同出的一种“异形陶器”，可能是文献记载的以瓦为框的“土鼓”。这种器物大小不一，上下口相通，腹部也有孔。上口边缘有陶钉数枚。

类似这样的陶器，在甘肃、青海等地也有发现。陶寺的“异形陶器”是否为鼓，尚待今后验证。

陶寺发现的这些音乐考古材料，有明确的地层依据，时代、文化内涵清楚，是一批科学的音乐考古材料。

特磬、鼍鼓都出于甲种大型墓，这些墓的随葬品多达一、二百件，且有龙盘之类的重器出土；与之相反，陶寺墓地众多的中、小型墓却随葬品贫乏，更无乐器出土。这表明拥有特磬和鼍鼓的墓主，身份、地位较高，掌握着祭祀和军事大权，是部落显贵或首领之类的人物。

财产的不均，造成贫富分化、阶级对立。而这时的特磬和鼓不仅是乐器，而且具有一定的礼器性质，是墓主等级、身份的标志。

陶寺的乐器，属龙山文化陶寺类型。此文化类型分早、中、晚三期，出土乐器均属早期遗物。据研究，陶寺类型的碳十四年代约从公元前25世纪延续到公元前18世纪，前后至少经历了六百多年。出土石磬和膜鸣木鼓距今约4400余年，是目前发现同类乐器中的最早标本。

陶寺遗址地处晋南，这里是传说中的“夏墟”所在，遗址的年代与夏代纪年也基本相符。这里出土的乐器，对探索夏代音乐文化是极为重要的。

偃师二里头遗址铜铃、陶埙

六十年代以来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一些铜铃和陶埙。下列几例可作代表：

1962年出土铜铃1、陶埙1　二里头文化

1981年出土铜铃1　二里头文化

1982年出土铜铃1　二里头文化二、三期

1984年出土铜铃1　二里头文化四期

二里头出土的铜铃，体制为合瓦形，体一侧带有扉棱，平顶，凹口，侈铣。顶上有环钮，体内可系铃舌。铜铃皆出自墓葬，有的铜铃出土时上有丝织品痕迹。

这些铜铃，颇可引起人们的注意。铜铃合瓦形的体制，与商晚期铙乃至周代的甬钟、钮钟都是一致的。二里头文化分四期，关于其文化性质，目前虽有争议，但出土铜铃的时代相当于夏商之际则没有多大问题。

二里头所出埙仅有1962年出土的一例。此埙与铃同出，一按孔，圆腹平底。除按孔数少外，造型已与商晚期五按孔埙接近。

从此埙有一按孔看，当可发出二声音列。二里头文化埙的音阶，反比时代早于它的姜寨仰韶文化史家类型埙的音阶简单。

殷墟妇好墓编磬、特磬、编铙、陶埙

1976年，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铜器、玉石器等。其中的编磬、编铙和陶埙是商代乐器的珍品。

编磬3件，1件保存完好，余皆残。三件磬合为一编，是商晚期编磬的组合常制。

据妇好墓发掘报告，此墓另出特磬2件。其中一件，上刻“妊入冉石”铭文。前二字，当为方国或族的名称，“石”字，原报告释为磬。全句可理解为妊冉方国或族进贡的石磬。

不过，从这件磬的形制看，还有一些可疑之处。此石顶端平，底端微弧，顶底两端的棱角被磨，悬孔位于近顶端中部。这种形制的磬商代未见，使人生疑。拿同墓所出石铲(标本3)玉圭(标本15)与此器相比，形状颇类。

此外，这件磬铭文的“石”字，恐还可另作别解。解放前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大墓曾出一灰色大理石双兽首立雕，铭文有“乡入石”三字。此物非磬，却以石自名。可见商代石字还可作为玉石器之类的通称。

因此，妇好墓具铭文的这件石器，恐怕可能是一般的礼器用品。

编铙5件，形制相同，大小相次。均体饰回字形阳线弦纹，口内缘铭文亚弜，一般称这组编铙为亚弜编铙。

此组编铙是迄今所见商铙组合件数最多的一套。其制作精良，音响亦佳。经试奏，知其听觉印象为G_4—A_4—C_5—E_5—G_5，已具备四声音阶。

这组编铙内壁光平，未见调音痕迹，可见其制作设计当是比较准确的。

妇好墓又出有陶埙3件，一大，二小。二小埙形制、大小相同。3件埙均有五按孔，按孔排列为前三后二。埙的形制在此时已定型，即都是圆腹平底、吹口端锐的型式。

妇好墓的陶埙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五按孔埙。它与编铙、编磬同出一墓，表明它们是具有一定规模和编制的合奏乐器。不过，这三件埙中，一大埙与二小埙的调高不同，当不可同时演奏。

殷墟妇好墓是一个长方竖穴墓，墓葬规模并不算大。但因是殷王武丁配偶妇好的墓葬，故等级高、随葬品丰富。象乐器在殷墓出这么多品种和件数的还不多见。此墓的时代属殷墟文化二期。相当此期的编铙，以前未曾见过。因而妇好墓编铙还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。

关于编铙铭文亚弜二字，一般认为是当时的方国或族的名称。可见，商代的音乐文化应是多方国、多民族共同创造的。这一点，已为殷商音乐考古发现的许多物质史料所证实。

殷墟西区墓编铙、编磬

1977年，殷墟西区墓葬出土了一批商晚期乐器。它们是：

编磬：M93五件　殷墟四期
编铙：M699三件　殷墟四期
特磬：M701一件　殷墟四期

编磬一墓五件，是今知商代编磬的最多组合件数，考古发现仅此一例。

这些编磬，四件完整，一件破碎。从磬的外形看，虽然还存在早期磬的不规整性，但通过修整磬的周边和表面来改善音质、调节音高的做法，已有明显反映。

五件磬中，有三件磬表面绘有白色动物形纹饰。这种工艺，既有美化磬的外观之效用，又可能具有一定宗教含义。

M93五件编磬初步测音结果如下：

77AGM93:3	F_5^{-6}
77AGM93:5	$A^{\#}_4{}^{-3}$
77AGM93:6	F_5^{+26}

77AGM93:20　　E_5^{-18}

77AGM93:2　　破碎失音

从上列音响材料看，M93五件磬不象是一组编磬，可能是单件特磬。

编铙一组三件，出自M699。其形制相同，大小相次。体饰兽面纹，柄中空与体内相通。柄末有“中”字铭文，可能是族徽之类的文字。这种带“中”字铭文的铙，《三代吉金文存》曾有著录。这次安阳又出同例，增加了研究的科学资料。

三件编铙的发音可构成二声音列，即B_4——$F_5^{\#}$——B_6；最大一件和最小一件为纯八度关系。这种音列形式，在以前公布的殷商编铙测音资料中尚未见过，因而是一个新的发现。

特磬一件，出M701。此磬器形厚大，长76、宽34、厚1.8厘米。直顶、直底，外形呈椭方形。

上述编磬、编铙和特磬，分别出自三座带墓道的甲字型大墓，而此墓区众多的中、小型墓却无乐器出土。这充分表明了拥有编磬、编铙和特磬的墓主身份、地位之显赫，应是奴隶主贵族；而其它中、小型墓的主人身份应属于平民，由此可见，奴隶社会的礼乐制度无疑是适应等级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。

宝鸡強国墓地编甬钟、铙、铃

宝鸡強国墓地主要分布在宝鸡竹园沟和茹家庄一带。1974年至1980年，这里曾先后出土了一批青铜乐器，计有编甬钟两套，每套三件。铜铙一件，铜铃一件。

竹园沟七号墓出土甬钟三件，为一组编钟。钟的舞篆鼓皆饰云纹，钲篆四边以小乳丁为界。其形制与过去西安普渡村长田墓发现的西周穆王时期的编甬钟相类，但时代比普渡村钟要早，即约当西周早期成、康之世，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组编甬钟，为西周甬钟的断代乃至甬钟起源的探索，都提供了重要的资料。

茹家庄M1乙所出一组三件编甬钟，形制与竹园沟七号墓甬钟相同，但时代比竹园沟编甬钟略晚些，即约当西周康昭之际。

这两组甬钟的音高是：

80BZM7：12　　B_4^{-44}——D_5^{+9}

80BZM7：11　　$E^{6}{}_{5}^{+26}$——G_5^{+8}

80BZM7：10　　B_5^{-45}——E_6^{-45}

74BRM1乙：28　　A_4^{+18}

74BRM1乙：29　　D^{6+28}——F_5^{+15}

74BRM1乙：30　　B_5^{+32}——$D_6^{-2}{}_{0}$

竹园沟甬钟的正鼓音，大体可构成宫、角、宫这样的音列结构，应为一组编钟之音列。

茹家庄甬钟已经修补，音响已非固有。

从这两组编甬钟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。西周早期甬钟一般三件一组，似为常制。这时钟的侧鼓音尚未与正鼓音明显分离，右鼓也无小鸟纹装饰。钟的内壁光平，音高不加微调。

铜铙一件，出于竹园沟M13。平顶、凹口、侈铣，短圆柱柄与体内相通，体饰兽面纹。其形制、纹饰与一般商晚期小铙全同。惟柄上已有旋，是其特别之处。这种构造，应是向甬钟过渡的一个环节。

关于甬钟的起源，有南来说和北来说两种。南来说主张西周甬钟源于南方大铙；北来说则坚持西周甬钟源于北方小铙。竹园沟M13所出铜铙，是一个重要发现。它出于周的墓葬，时代相当于西周初期，形制上又有向甬钟发展的特征，为甬钟起源于北方小铙说增添了新的例证。

宝鸡地区是周人的发祥地和周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区。西周早期甬钟和铜铙都出于此地，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一个突破。

強国墓地还出土有一件直柄铜铃，这件铜铃出于茹家庄M1乙。铃体呈合瓦形，铃

口略呈菱形，体内有悬舌，体饰兽面纹，应是一种摇奏体鸣乐器。目前国内的发掘品仅此一例。

类似这种乐器，过去《猷氏集古录》一书收录一件。形制与茹家庄所出铃相同，惟铃舌已失。陈梦家名其为铎，但验之以出土带自名的铜铎，形制与这两件铃悬殊较大。因此，这类摇奏乐器的名称是否为铎，还可进一步考虑。

周原召陈遗址编磬

1980年，陕西扶风周原召陈乙区遗址出土了不少西周编磬，但多已破碎。经拼复的编磬有三件，时代属西周中晚期，现藏周原博物馆。

这三件编磬形制相同，器形厚大。倨顶、弧底，鼓、股分明。磬表面刻夔纹，周边刻鳞纹。可惜的是，编磬拼复后加石膏固定，已不可测音。因此，虽然这三件夔纹编磬大小相次，但它们原来是否为一组，就不可确知。

在召陈乙区编磬出土之前，西周磬在考古发现上几乎还是空白，甚至有人对西周是否有磬产生了怀疑。这次召陈乙区编磬的出土，不但证明了西周有磬，而且从形制看，西周磬当承自殷商，且组合件数也应有所增加。

眉县编甬钟、编镈

1985年8月，陕西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发现一西周青铜器窖藏，出土编甬钟15件、编镈3件。出土后，甬钟曾遭盗劫，5件下落不明，现余10件，均藏眉县图博馆。

10件甬钟可以分三式。一式为逨钟，即一个叫逨的人所铸的钟，现存4件；二式为窃曲纹钟，共4件；三式为云纹钟，共2件。从钟的形制看，当为西周中晚期制品。

这些甬钟，每钟可发两音，即正鼓音和侧鼓音。侧鼓音一般是正鼓音的上方小三度。有些钟在可发侧鼓音的右鼓部，还有一个小鸟纹作为标志。正、侧鼓音连奏可构成羽・宫・角・徵四声音阶。

这些甬钟的内壁，多有数目不等、深浅不一的沟槽，当是磨锉钟内壁对音高加以微调所形成。

十件甬钟的音高约如下：

甲组（云纹钟）Ⅰ：$B\flat_3$

甲组（云纹钟）Ⅱ：$D\flat_4$

乙组（逨钟）Ⅱ：$B\flat_3$

乙组（逨钟）Ⅰ：D_4——F_4

乙组（逨钟）Ⅲ：G_4——$B\flat_4$

乙组（逨钟）Ⅳ：G_6——$B\flat_6$

丙组（窃曲纹钟）Ⅰ：F_4——$A_4\flat$

丙组（窃曲纹钟）Ⅱ：$B\flat_4$——$D_5\flat$

丙组（窃曲纹钟）Ⅲ：F_5——$A\flat_5$

丙组（窃曲纹钟）IV：$B\flat_5$——$D\flat_5$

上列甲组二钟，右鼓无小鸟纹，正鼓音连奏为羽・宫，恰与同窖所出丙组四种调性相同，音列相衔接。即可连续构成羽・宫・角・徵这样的音阶结构，可见它们本应是一组。

乙组（逨钟）四件，从发音看为一组甬钟所有之其中四件，但音区有缺。从西周中晚期钟的组合和音阶构成的通例看，应缺第一、五、六、七钟。其完整组合当是八件，音阶结构为常见的羽・宫・角・徵关系。

编镈3件，形制相同，大小相次。平顶，上有二凤鸟衔接的悬钮。鼓腹、平口，底视口部为椭方形。镈体饰夔纹组成的兽面，镈体正中及两侧有扉棱。二侧扉以虎为饰，二中扉以凤鸟为饰。

这组编镈，时代约当西周中期，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编镈。初步测音，其听觉印象如下：

一号镈：D_3

二号镈：F_3

三号镈：A^{b}_{3}

显而易见，这组编镈的邻音音程为小三度。

既然编镈与甬钟同出，那它们之间关系又将怎样呢？

若把编镈发音填列于徕钟之间，其音列为 mi、sol、降 si 关系；若把编镈发音填列于甲、丙二组甬钟之间，则其音列为升do、mi、sol 关系。这里，无论降si还是升 do，恐怕都不可视作与同出甬钟一起构成的音阶变音，因为这样的音列关系在目前发现的殷商和西周种类乐器里还未见过，并且从听觉上也难于接受。因此，这就提出了疑问：编镈与同出甬钟是否配套？这一问题，值得今后探讨。

宝鸡太公庙和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乐器

1978年，陕西宝鸡县太公庙村发现一铜器窖藏，出土甬钟 5 件，镈 3 件，皆保存完好，时代属春秋早期。

钟、镈皆有铭文，据铭文内容，这些钟、镈当为秦武公所造。

十分明显的是，钟、镈的形制和纹饰都沿袭西周晚期作风，表现出秦的早期音乐文化保守的一面。从钟、镈的音阶构成看，也是如此。

经对秦公钟、镈测音，知其为成编成组的乐器。甬钟的音列，同于西周中晚期甬钟，即同是羽·宫·角·徵结构。但按西周中晚期编钟八件合为一组的常制，秦公编甬钟尚缺第五、六、八三钟。

三件秦武公编镈，形制与克镈和传世秦公镈可以比较。秦武公镈与克镈体部均有菱形枚组成的围带，扉棱以夔龙为饰，形制、纹饰均较接近。克镈为西周晚期的作品，秦武公镈的形制当承袭西周晚期镈发展而来。

传世秦公镈除保留有扉棱外，已出现了枚，这是与秦武公镈的重要差别，显出时代较晚的特征。秦武公镈的时间介于克镈和传世秦公镈之间，填补了这段时间镈的空白，因而比较重要。

秦武公镈的发音与同出编甬钟也不相协调，这种情况，与前述眉县编镈和同出甬钟的音响相似。钟、镈为同一秦公所造，且出于同一窖藏，但却不可一起合奏，这确是个有待探索的问题。

另一项秦文化音乐考古的重要发现，当推1976年至1986年在陕西风翔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。此墓出土不少石磬，但多残断，完整品或可以拼复粘合的有七件。

编磬十分厚大，最大者可长达一米左右。磬的形制独特，周边皆凹弧。有些磬的周边刻有铭文并填以朱砂。据编磬铭文，磬当为春秋中晚期秦景公时的制品。

经初步测音，可知这些编磬具备一定音阶结构。从测音看，它们不是一组，至少应有两组。

宝鸡太公庙秦武公编钟、编镈和秦公一号大墓编磬的出土，为探索秦的早期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史料。秦公一号大墓所出编磬，形制与前述周原召陈西周中晚期编磬应属同一发展体系。考古发现表明，秦的早期音乐文化继承周文化的因素较多，只是到了晚期，它才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异。

江陵雨台山21号楚墓律管

1986年，湖北江陵雨台山21号战国楚墓出土了 23 弦瑟一件，律管四支。

四件律管为楚墓首次发现，竹制，出土时已残。上有墨书律名，墨书处经刮削，呈条状平面。

律管上的律名，大体有如下几个：

浊穆钟　浊兽钟　定新钟　定文王

浊文王　坪皇　姑洗

上列律名，与曾侯乙墓钟、磬铭文里的

楚律名是一致的。有所不同的是，定新钟、定文王这种冠以定字的律名，为曾侯墓所无。而定字的具体含义今尚不明。

姑洗是新出现的楚律名，也为战国早期曾墓钟、磬铭文中的楚律名所无。据文献记载和曾墓钟、磬乐律铭文，姑洗为周律名。雨台山21号战国楚墓的时代又比曾墓晚些，即在战国中期偏早，这就意味着楚国已逐渐吸收了周的个别律名。

关于古代定律法，向有以弦定律和以管定律两种说法。雨台山21号楚墓的律管，不仅提供了新的律名资料，而且也为以管定律说提供了佐证。

天水放马滩秦简律名

1986年，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战国晚期秦墓出土了一批秦简。这批简中反映了一些十二律的名称以及生律法的一些情况。

简的《日书》部分有一些律名，如《日书》乙种的《律书》有云：

> 甲九木，子九水，日出□□水，早食□□□，林钟生大簇，大吕七十六，□山。（乙76）
>
> 乙九木，丑八金……大簇生南吕……（乙77）
>
> 丙七火，寅七火……南吕生姑洗，夹钟六十八……（乙78）
>
> 丁六火，卯六水……姑洗生应钟……（乙79）

又《巫医》云：

> 旦至日中，投中蕤宾，马也。……（乙94）

又《占卦》云：

> 夷则、黄钟、姑洗之卦日是……（乙133）
>
> 毋射、大簇、蕤宾之卦日是……（乙163）
>
> 天降令乃出大正，间吕、六律，皋陶所出，以五音十二声为某贞卜，某自首……（乙157）

除去其中的迷信成份，可知秦的律名与文献所载周的律名相同。秦的律名应是继承了周的律名。十二律名在战国晚期当已趋于统一。

上引《律书》中所反映的生律法，与《吕氏春秋》所述是吻合的。如以简乙76至乙79与《吕氏春秋》比较，林钟至应钟的生律次序完全相同。这表明放马滩秦简的生律法是《吕氏春秋》系统的。

放马滩秦简的内容尚未完全公布，从何双全同志对这批简的综述来看①，其中还有不少涉及古代乐律学的文字材料，如六十律相生法、律数等等。这对于研究古代乐律学无疑是很重要的。

限于篇幅，还有不少重要的音乐考古发现，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编钟、编磬、石排箫；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编钟、编镈、编磬镈于、钲；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编钟、铃钟、编镈、镈于、钲等，在此不能一一介绍，敬希读者鉴谅。

---

① 何双全：《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》，《文物》1989年2期。